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high-angle, aerial photograph of a river valley. A river winds through the landscape, forming a large, irregular loop. In the center of this loop, there is a small, densely populated area with buildings and trees, likely a village or a small town.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is hilly and appears to be covered in vegetation. The sky is visible at the top, with some clouds.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somewhat muted, with a lot of grey and brown tones, suggesting a historical or documentary feel.

人与自然： 20世纪怒江峡谷 人地关系史

王东昕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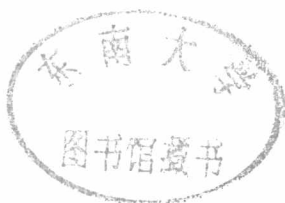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533023

X24
59

人与自然： 20世纪怒江峡谷 人地关系史

王东昕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与自然: 20 世纪怒江峡谷人地关系史 / 王东昕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 - 7 - 5004 - 9185 - 9

I. ①人… II. ①王… III. ①人类活动影响 - 环境 - 研究 -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 20 世纪 IV. ①X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7481 号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王兰馨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6.125

插 页 2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序

林超民

进入 21 世纪以来，怒江大峡谷自然灾害不断，吸引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

面对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人们自然会追问：怒江大峡谷生态恶化的缘由何在？

王东昕的新著《人与自然：20 世纪怒江峡谷人地关系史》为人们提供了寻求答案的重要参考，或者说提供了可资参考的重要答案。

东昕的新著，是第一本系统研究 20 世纪怒江峡谷人地关系的学术论著，从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上，探讨了怒江峡谷人地关系演变的历史，总结了人地关系中有益的经验 and 值得鉴戒的教训，适应了生态危机下探寻解救之策的迫切需要。

东昕的新著是研究怒江峡谷人地关系的创造性的成果。全书有不少独到的创新之见。最为精彩的就是以执著求真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严谨求实的考证，可靠翔实的资料论证了 20 世纪下半叶怒江峡谷人地关系史上“沉重的代价”。

东昕的新著指出：长期生活在怒江峡谷的傈僳族、怒族、白族、独龙族、藏族等居民，千百年来在谋求生存、发展而与自然

生态环境相互依存的紧密联系中形成的传统农耕方式，是适应当地特殊自然生态环境的有效、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而不顾当地生态环境，违背人地相互依存规律的所谓外来“先进耕作技术”，因“水土不服”不仅没有促进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改善、提高人民生活，反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威胁数万人的生存，有些地区人们立地生存的条件丧失殆尽。正是对所谓“先进”生产技术的过度自信，对物质经济发展的过度强调，违背了当地人地关系的特殊规律，才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而为治理生态环境所采取的“移民”和“退耕还林”等措施，也因违背人地关系的客观规律而事与愿违，得不偿失。五十多年来，怒江峡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取得了人们自诩的骄人成就，但是，“怒江峡谷地区的环境为之付出了太过沉重的代价”。

当我们读到这些饱含对怒江各族人民深深爱恋、对怒江峡谷环境深深敬畏、对怒江地方文化深深尊重、对怒江人地关系深深理解的文字时，心灵受到的震撼、精神受到的洗礼、思想受到的启迪，真是难以言表，不禁对作者的独立思考、独到见解，独特气质肃然起敬。

人类学家在对待异文化时，不是以自己的文化标准来判断别人的文化，这个“别人”也称之为“他者”。因为文化是人们在千百年的长期生活、生产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起来的，文化与人们生存的时空有极大的内在联系。人生活在天地之间。特殊的天地环境，创造特殊的文化。文化的高低、好坏、优劣，必须从生存于具体环境也就是特殊的天地之间的人们自己的内在文化细加评判考量，而不能用外来的标准横加褒贬臧否。离开了具体的人地关系，侈谈文化的高低、好坏、优劣，必然会得出违背具体时空，违反客观规律的结论，做出错误的决策。对于“他者”

的异文化，不应该轻易地用“原始”、“落后”、“低下”等歧视的眼光加以否定、贬斥、指责、打压，应该深入地研究、细心地考察、认真地理解。只有身临其境地参与观察，和当地居民同甘共苦地劳作度日，才能真正地体悟和理解。只有正确的理解，我们才会对“他者”的异文化由衷地欣赏。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仅只是方法问题，而是一个学者应该具备的起码的道德操守和职业水准。正因为具备了这样的道德操守和职业水准，东昕才能对怒江峡谷居民创造的文化做出真诚的同情，同情的理解、理解的赞赏，也才能发现怒江峡谷人地关系的基本规律，才能认识怒江峡谷居民的生存智慧，才能揭示违背规律不得不付出的“沉重代价”。

怒江大峡谷的居民对自然的崇拜衍生为敬畏天地的宗教情绪。怒江居民的原生的宗教不是制度化的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他们赖以生存的天地的自发的顶礼膜拜。他们利用天地求得生存与繁衍，当他们获得果腹的食物、保暖的衣服、居住的房舍、生命的延续，他们会虔诚地举行宗教礼仪以牺牲向天地表达感恩之情；当他们在耕田种地、放牛牧马、打虎驱狼时不慎伤及大自然的发肤之时，他们也会以同样虔诚地举行宗教礼仪以牺牲向天地表达赎罪之意。当“现代化”用科学、商业、工业的“推土机”对怒江峡谷伤筋动骨之时，宗教被斥为虚幻，信仰被贬损为迷信，牺牲被嘲讽为愚昧。失掉宗教制衡的科学理性彻底粉碎了人地之间依存、互保、同生、共荣的和谐关系。只有对自然的无尽索取。“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的，天不会说话、地不会说话、美丽的大峡谷不会说话，但是天的神灵与地的母亲会保护、养育、眷顾他们的生灵。同时天地也会以洪涝、干旱、滑坡、泥石流、病虫害向贪得无厌、过度索取的人们表示惩罚。天地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天地被人类无度索取

造成的天灾，也就是无可置疑的人祸。生态环境的恶化，就是人类末日的前兆。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迫在眉睫、时时可以感受得到的天地警示。

东昕的新著提醒我们，怒江大峡谷和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各族居民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与地融为一体，相依相存、共生共荣。怒江峡谷的山水田园不仅是他们种植庄稼，放牧牛羊、猎取禽兽的土地，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空间，甚至就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关爱峡谷的山山水水，就是关爱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世代生息在这里的居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怒江峡谷拥有不可分割的利益和权利，这是天赋的高于任何功利的权利。只要不把人们头上的天和脚下的地分割开来，怒江峡谷的生态环境就可以得到保护，怒江居民的生活就能和谐永续地发展。

我不止一次到过怒江大峡谷，大峡谷峻峭的山岭、苍翠的林木、缥缈的云雾、清澈的泉水、飞流的瀑布、奔腾的江河、优美的田园、静谧的村寨、庄严的神庙、肃穆的教堂……无不令我神魂荡漾，神思驰飞。怒江大峡谷更令人深感敬畏。在怒江峡谷，我更多的感受是巨大、悠远、崇高、永恒。身处怒江峡谷，你可以突破眼界，开阔心胸，升华精神，摆脱人类自高自大的心态，超凡脱俗，淡泊功利，敬畏自然，探寻人地关系的和谐。只有减少对自然的索取，增加对自然的养护；减少对自然的强拆，增加对自然的关怀；减少对自然的危害，增加对自然的进益；我们才能建立起和谐的人地关系。只有建立和谐的人地关系，我们才能永续发展，才能享受安宁、愉悦、健康、美好的幸福生活。

东昕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在著名考古学、民族学大家汪宁生教授的指导下获得民族学硕士学位，在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时，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师友之情。他为研究怒江峡谷

的人地关系史，读遍了与怒江有关的所有历史文献和当代史志，认真研究了人地关系的重要论著。他曾在怒江州泸水县担任一年多的乡村干部，对当地人地关系做了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到思茅地区（今普洱市）曼老江开发区深入了解怒江州的移民状况，取得许多真实、准确、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撰写的博士论文理所当然地获得同行专家的赞赏。无论是背靠背匿名的评审专家，还是面对面答辩的教授都一致肯定，他的论文是研究 20 世纪怒江峡谷人地关系史的创造性成果，是我国人地关系史研究的创新之作。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东昕没有急于刊布他的著作，而是多方求教、反复推敲、再三修改，才付梓出版。东昕的新著，并非十全十美，并非没有可以商讨的余地，但是他这种实事求是、严谨慎重、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的确值得我们学习。

进入 21 世纪已经十一个年头了。在怒江峡谷不时传来自然灾害的报警之声，怒江大峡谷人地关系日趋紧张、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由此引起的争议之声不绝于耳之时，东昕的新著《人与自然：20 世纪怒江峡谷人地关系史》的出版，无疑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

2011 年 7 月 16 日于昆明

内 容 简 介

所谓“人地关系”，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人、自然/环境、文化三者有机结合而成的一个整体。三者之间具有双向或多向的互动关系，他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或相互促进，每一个构成部分的存在与变化都将影响到其他构成部分的存在与变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三者之间相互发挥影响的作用从来不是恒定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自所能发挥影响的作用始终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可谓此起彼伏、此消彼长，但是从来没有哪个构成部分会完全失去其所具有的影响的作用。正是各构成部分的共同作用促进着人地关系的发展变化。

自然或环境的意义是因人类而生，因为人类的参与，自然或环境才具有了我们人类赋予它的各种意义。因此，有无人类参与的生态系统在本质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对它的研究在意义和方法上也是极不相同的。如各种自然灾害，无人类参与时，我们称之为地质运动、气象气候变化；当有人类参与时，因为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实质性影响，相对于人类而言，我们就称之为自然灾害。在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中，区分哪些自然灾害是客观存在的，哪些自然灾害是因人类的生存行为而被强化了，对于正确认识人地关系至关重要。

怒江峡谷地区位于中国西南边疆云南省的西北部，因为地质构造复杂，峡谷切割很深，是一个地质运动活跃的地区，自然生

态系统的结构非常脆弱，并非人类谋求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空间。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这一地区在空间上与其他地区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生活在峡谷地区的各民族与峡谷外其他民族极少交往，因此，各民族在长期生存实践中创造的文化在一种自在状态下影响着人地关系的结构与状态。自然环境的状况对他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人们的生存十分艰辛。随着社会的发展，主要是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在来自峡谷外社会力量的影响和推动下，原来的那种封闭状态被彻底打破，这一地区的社会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传统的生活方式被明显地改变了，人地关系的发展也受到更多更复杂因素的影响：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对人地关系的影响力逐渐下降；主要是在外因影响的作用下，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生存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人地关系主要是在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下被极大地改变，其发展出现了很多问题，人地之间的矛盾逐渐变得尖锐了。

前 言

关注环境，其实就是关注人类的现在与未来。

约半个世纪前，一位美国女性向沉醉于技术进步带来社会繁荣、发展技术可以有效解决发展中所能遇到的一切问题的人类发出警世恒言，在震撼了广大民众心灵的同时，作者也饱受一些社会利益集团的诋毁和攻击。直到去世以后，她充满睿智的伟大贡献才渐渐为曾经自以为是的社会所承认，而且唤醒了广大民众和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意识。这位遭受了不公平待遇的伟大女性就是蕾切尔·卡逊，她留给世界的不朽遗产就是每个关注环境问题的学者或社会大众必备必读的《寂静的春天》。^① 应是生机盎然、花开鸟啼的春天，怎么会变得寂静无声了？

卡逊的思想掀起了一场环境保护运动，甚至成为了从心底里真切关注环境问题者以及那些企图以环境保护这一标签伪饰自我的环境破坏者们都喜爱的话语。正是在这样一种真假相杂、真伪相伴甚或是钩心斗角的争辩声中，人类又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关注环境问题的人群和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然而，环境问题、生态危机却越来越严重。怎样看待人类发起的这场环境保护 vs. 环境破坏的运动？环境问题、生态危机又是因为什

^① 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么样的原因而日趋严重？以关注人类文化为核心问题、擅长观察和研究人类生存经验与教训的生态人类学伴随着有关环境问题的争论而不断发展。在生态人类学的视域中，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视角看待人与自然、文化与环境所构成的人地关系？应该以什么样的思想来指导人地关系的发展？导致当前出现的环境问题的原因究竟何在？哪些环境问题的出现确实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行为有关？……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生态人类学的观察和思考确实应该为解决当下以及未来将始终困扰人类的环境问题做出应有的贡献。

笔者尝试运用历史学和生态人类学的相关思想和研究方法，通过学理推论与实证调研，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所辖的怒江峡谷地区为研究范围，在建构 20 世纪怒江峡谷地区人地关系史的基础上，对影响该地区人地关系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发挥的影响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同时也针对当地环境条件下社会的发展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思考。笔者才疏学浅，有关思考与分析或仅为一管之见，现提出，以供方家批评指正。

目 录

内容简介	(1)
前言	(1)
第一章 人地关系的学说史	(1)
一 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史	(2)
二 互动的人地关系	(5)
三 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传统文化	(11)
四 动态中发展的人地关系	(14)
第二章 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	(16)
一 封闭的滇西北一隅	(17)
二 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	(18)
第三章 自然灾害史	(25)
一 20 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灾害	(29)
二 1950 年代以来的自然灾害	(31)
第四章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封闭的生存空间与 民族社会	(42)
一 封闭的峡谷生存空间	(43)

二	自然环境对民族社会的影响	(54)
第五章 冲突与融合: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异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一	西方文化的传入与发展	(62)
二	汉文化的进入与发展	(64)
二	汉文化的进入与发展	(87)
第六章 社会制度与民族平等权利的发展		
一	怒江峡谷地区的解放和人民政府的建立	(108)
二	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社会进步	(109)
三	跨越历史的社会主义改造	(111)
三	跨越历史的社会主义改造	(120)
第七章 沉重的代价: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人地关系史		
一	传统生计方式的生态适应性	(129)
二	水土不适的先进耕作技术	(130)
三	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	(132)
四	关于环境治理的问题	(139)
四	关于环境治理的问题	(148)
第八章 资源可转化利用的有限性		
一	丰富多样的植物资源	(161)
二	丰富多样的动物资源	(162)
三	丰富多样的动物资源	(166)
四	高经济价值的地质矿产资源	(169)
四	并非所有资源均可开发利用	(170)
结语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第一章

人地关系的学说史

所谓“人地关系”，其实就是人与自然、文化与环境的关系。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人类关于人自身与自然、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始终伴随着人类的成长而发展，从未有过中断。就本质而言，人类全部的所思、所想——无论是物质的生产活动，还是精神的创造活动——无不反映着人类对自然或者环境的认知状况。正是在这种认知的基础上，人类才有可能开始其他的诸如食物获取、劳动组织、制度创设、审美创造等一切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所需的实践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人地关系的研究，实际上构成了所有关于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研究的基础，离开了对这种关系的理解和认识，任何其他的研究都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般。

从学说史的角度看，根据确切可信的文献记载，很早以来，先贤哲人们就开始了对人类与自然、文化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索，并形成了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在后人们不断地继承与批判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成为后学者不断进步的基础。但是，在后世的继承与批判中，往往因为后学者难免模糊了前期各种理论学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知识背景，或多或少是以否定的态度对待旧学说、阐述新观点。这样一来，不仅未能从前辈贤士们的智慧中汲取到充分的养分，而且后世的观点也无法回避开新时代的

褊狭见解之嫌，从无限延伸的整体历史的视角综观之，大多又形成具有新时期主客观局限性的片段式或局部观的认识。特别是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研究主题不断地被深化，同时作为整体的观察和研究对象也被不断肢解，这就导致了对整体的认识越来越模糊，而对局部的认识却越来越深化的现象产生。这种发展趋势并不利于关于人与自然、文化与环境关系问题的研究，对局部或者说是对其的不断细化与只能从整体上全面揭示人地关系演变的学说史来说是相悖的，导致了生态人类学的学说史较为明显地出现了一种非连贯性的、前后相继的特点。鉴于此，在开始阐述关于中国云南省怒江峡谷地区 20 世纪人地关系史的认识和分析前，有必要回顾有关人地关系的学说史，把自己的学术史观作一清楚交代，这样可能有助于他人对我之观点进行批判。

一 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史观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一学说要求从总体上、全局上研究社会的一般结构和一般的发展规律，强调要承认历史、尊重历史而且必须坚持历史地看待问题的观点，对认识人地关系的学说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人类的历史是由人类不断地创新而推动并向前前进的，人类也总是在追求不断地创新，但是，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从来没有什么创新是建立在对过去完全否定的基础上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任何一项创新，无不与之前已有的知识、技术、组织、制度等存在无法割裂的内在关系。就有关人地关系的学说史来说，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回顾与批判，不难发现：从环境决定论到可能论，到技术或文化决定论，

再到多种生态学，实际上都难以避免地出现了割裂或孤立被观察和研究对象整体性的问题，都没能够完全克服人地关系理论学说继承与批判中的历史片段性以及断裂性。

在详细说明关于人地关系学说史观前，想起了曾任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席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詹姆斯·皮科克（James Peacock）在讲述关于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时曾经引用了一句打油诗：“两个人从同一个酒吧往外看，一个人看到的是地上的泥浆，另一个人看到的是天上的星星。”^①这句话看似简单，其实寓意深刻。

从文化研究的历史看，因为观察和研究者的背景以及主观目的的差异，由于观察的视角和研究者的侧重点不同以及观察和研究时的场景的不一致，常常会导致对同一客观现象产生不同的观察结果和分析结论。实际上，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种观察和分析的产生的差异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这种差异正好反映了在人类不断观察客观世界的一切现象并努力探求内涵于其中的各种客观规律的过程中，已然出现或可能存在的各种事实。这些事实就是：在观察与分析的过程中，任何的个人都只能注意到客观世界的某一个侧面，从来也没有人能够真正地对整个客观世界的全部或者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客观方面形成全面的观察和分析。因此，任何时期的任何观察者和研究者所能做到的，其实都仅只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切入，看到的也仅只是整个世界的一个片段或一个局部而已。换言之，无论是以往的前辈，还是现在的我们，在观察和阐释有关人与自然、文化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我们都只是从某一特定的视角出发，我们所形成的认识，实际上都只是关于

^① 詹姆斯·皮科克：《人类学透镜·初版序言》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